

在任何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市場力量）和「看得見的手」（政府規制）往往協同作用，相得益彰。但在中國，「看得見的手」往往被「看不見的腳」所取代，而且「腳」踩住「手」的現象比比皆是。研究者在分辨「手」「腳」時自然要耗費不少力氣。

——編者

博弈和法治的灰關

梁治平的〈伸冤與維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建構法治秩序〉（《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號）一文刊載之際，文中所論案例的當事人維權硬漢高鐵鋼，卻被「三門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搶劫罪、敲詐勒索罪、行賄罪及原判侵佔罪數罪並罰宣判他有期徒刑19年。」對此判決，高已提出上訴。由此可見，至少在一輪訴訟宣告終審之前，圍繞「伸冤」和「維權」，從正反兩面展開的「高案」系列，還遠未到塵埃落定、鐵板釘釘的完結篇。

從相關報導介紹的背景情況看，高在當地屬於社會關係資源相對豐富的人物，可獲取的財力和人脈資源支撐，都較之尋常人等明顯勝出一籌。但面對其伸冤所向、維權所繫的「法治」體制，他已逾常人的社會成本優勢，卻仍遠不敷使用，不堪消耗。

儘管形諸媒介報導時，這層以「公民」個人為主體、以體制形態為對手的依法維權的社會／經濟成本反差關係，被刻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意或無意地湮沒、遮蔽於上訪鳴冤、新聞曝光，以至起訴律師等充滿博弈意味的戲劇化細節，但這並非一場真正的博弈，因為這裏不存在一個足以超越局外，有效均衡雙方權利資源的配置和運用的外部機制。

因而，正如古老故事中置身「灰關」困境的那位在情與理、利與力的雙重煎熬下，最終不得不撒手放棄親子的母親一樣，居於劣勢而偏要執著於依法伸冤和維權的一方，到頭來多半還是很難規避從「法治」的灰關界線內自動出局的傾向，甚至走上以「不法」濟「依法」、取道「法外」而求庇於「法治」的極端悖謬之途。

李林榮 北京
2007.12.15

政府主導才是中國大陸住房政策的本質

讀了朱亞鵬的〈市場主導的中國住房政策：問題與挑戰〉（《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號）一文，總體上同意他對「新自由主義」住房體制的批評，但我以為國內住房政策的本質是政府主導，跟歐美很不同，

它是在政府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

國內經濟實質上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實際有相當約束力的指導性計劃是政府主導市場的一個方式。另外還有兩個重要方式：一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特別是固定資產的投資，一是國有資本的高度集中和壟斷。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國有資本的集中、壟斷，也是保證指導性計劃得以實現的手段。但要實現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國有資本的集中、壟斷，就必須最大限度地聚集社會財富，以保證政府佔有最大的資本比重。

政府對社會財富的聚集主要通過五個途徑：一，政府稅入的高速增長；二，國有資本壟斷利潤的高速增長；三，實行土地財政政策，對土地轉讓的規模和價格進行控制；四，設立和維護各種政策性壁壘；五，進行社會性節支，也即壓縮國家福利。「新自由主義」正是服務於政府聚集社會財富的策略。在住房、醫療、教育問題上，「新自由主義」都是一方面壓縮政府支出，一方面又為政府聚集財富。住房問題特殊的情況是還有一個土地控制因素在裏面。自由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由此演變為政府主導的

「新自由主義」，弱化了「新自由主義」良性的一面，擴大了「新自由主義」惡性的一面。

顧則徐 廣州
2007.12.15

醫療體制改革之痛

〈醫治中國病：醫療體制改革的兩條路線之爭〉（《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號）一文，集中討論中國醫療體制改革中醫療費用超速增長的問題，比較兩種改革思路，着眼於醫療服務需方的視角，探討化解「看病貴」的改革路徑。文章有其現實價值，但某些問題，我們仍需作進一步思考。

在「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與醫療服務經濟可及性的下降」部分，作者認為兩者具有因果關係，並引用衛生部統計數據作為支持，卻沒有說明該統計的對象、標準及技術。如文章認為更多民眾因經濟困難而放棄門診，但此處的門診是否僅限於正規醫院？基本衛生保健是否也通過其他選擇，如私人診所而實現？其程度如何？進而，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是否真的在不斷惡化？

在「市場化與醫療服務體系的社會公益性淡化」部分，作者指出醫療服務體系的社會公益性與其所有制形式並不必然相關。但關於醫療機構所有制的討論並不能替代對市場化的研究。在「結論」部分，作者沒有說明醫療服務的市場化與社會公益性並存之必要及如何可行。或許文章應提供醫改市場化的利弊分析，補充市場化與社會公益性的關係論證，才

能理清兩者的關係位置，其支持的改革思路也更有說服力。

徐昕 成都
2007.12.16

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礎

楊東平的〈中國教育公平的問題與前景〉（《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號）一文指出，教育領域嚴重地存在不平等和腐敗現象，教育權利的不平等和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成為了教育領域的兩大問題，而教育機會不均等則成為了教育公平和教育民主化的最大瓶頸。因此，入學機會的平等成為了公民平等享受教育機會的底線訴求。在當前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城市教育優於農村教育，重點學校優於普通學校，發達地區教育優於落後地區教育，這是不可迴避的事實，也是處理大國教育公平問題的累積性「不良資產」和歷史性壁壘。

因此，清理「教育產業化」政策、科學設計考試制度、取消重點學校的特權配給、擴大助學貸款、打擊教育腐敗現象是當前實施教育公平的重點。同時，需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教育發展，扶持和鼓勵私立教育，尋求差異化和個性化教育設置。西方國家就是通過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發展從而滿足不同家庭、不同學生需要的，公立教育重點保障公平，而私立教育落實教育選擇，充分反映「同意尺度」和「多元尺度」的公平基礎上的選擇取向，以及顯現教育平等主義和教育自由主義的有機結合。

陳潭 長沙
2007.12.17

還能挽回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嗎？

讀揭露、反思專制時代的文字，按理應該是會讓人激動、憤怒的，然而〈挽回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讀韋君宜〉（《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號）一文，卻並未讓我產生多麼強烈的心理反應。

為甚麼會這樣？過去的災難還沒得到真正徹底的反思、清算，新的災難一次次重新上演，而我，甚至是我們的神經已然冷漠、麻木。難道我們這些讀書人缺乏良心嗎？未必。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是凡人，良心、同情、冷漠、麻木都可能會在我們身上出現，問題是甚麼樣的機制可以刺激甚麼樣的心理反應。面對災難、不公，我們自會激憤，但激憤應該是走向行動的前奏，而不應該只限於激憤的言辭。但是我們所處的環境，卻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公民行動的權利。既然沒有合法的途徑行動，而我們又要活下去，我們只好遠離良心，親近冷漠。

就此而言，我們仍然生活在韋君宜所反思的那種時代中，我們仍然是這種時代的順民。至少我個人，仍然不敢挺直身體，像一個真正的公民、一個康德所謂的真正的啟蒙者那樣發言、行動。我依然是權力的順民，而且是更為虛偽、怯懦、自私的順民。韋君宜們的反思，能夠挽回這樣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嗎？

姚新勇 廣州
2007.12.17